

近代中国的意识危机^{***}

□李 幸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 210009]

[摘 要] 近代中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在此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肩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中西方文化冲击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在意识领域展开了对中国前途的摸索。

[关键词] 近代中国; 意识形态; 危机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7)02-0071-04

鸦片战争后,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忧患,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运动,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为了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知识精英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多形式中构成观念形式的上层建筑的部分。在社会形态的更迭时期,新旧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斗争尤为激烈。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影响,表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中的继承性。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政治秩序的危机,也是更深层的和意义更深远的意识领域的危机。

一、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意识危机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至五四运动前的2000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学术界。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文化及意识观念也随之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危机使知识精英们意识到,国家的强大更需要的是先进的制度,此时,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都在被怀疑与重估。

(一)“回向原典”与“大乘佛教”的复苏

儒学经过千年的发展,在明朝进入“新儒学”发展阶段。“新儒学”也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对儒家经

典的诠释并不能使广大儒生心悦诚服,大量的儒生们要求更接近圣人的原始资料来恢复儒家的原始学说。在这种“回向原典”^[1]的内在冲力中,古典非正统哲学也开始复兴。从前的儒生们都强调非正统哲学与儒学思想的对立性,而此时的中国思想界却认为两者在哲学思想上有紧密的联系性。这种对非正统哲学的兴趣倾向于一种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关怀。虽然,没有一种非正统古典哲学在这场思想复兴中重现,但是“诸子学”的重现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大乘佛学也在非僧非侣的知识界中复苏。知识精英们对佛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了现实的救世倾向。现实社会民生艰难,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信仰发生了动摇,重新寻找一个意识领域的支点成了他们新的努力方向。

通过“诸子学”与“大乘佛教”的复兴,可以看到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正在衰微。这种衰微主要来自于社会存在使社会意识发生改变,在国家危亡之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们对当时的统治秩序本身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也延伸至道德领域。

(二)西方自然科学的流入

儒家的“天命”思想推崇天子是保持宇宙和谐的“天”的代理人,是人类与宇宙间的枢纽。这种神秘性在19世纪末渐渐被粉碎,西方文化的科学宇宙论与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发生了冲突,体现“平等”思想的基督教的传入对抗着儒家传统“仁”的等级之爱。由此,以“天命”“王权”为基础的东方秩序被打乱。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使国人得以形成某种思想框架和观念,

• [收稿日期] 2006-09-08

• [作者简介] 李幸(1976—)女,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研究生。

并使之构成具有整体意义的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上,社会关系被定型化,人们的思想上形成了“普遍秩序”。这种秩序使中国人的思想免于认知上的矛盾和价值上的迷惑。但这种秩序被打破了,中国的意义世界都被瓦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不适应与不协调,东方秩序的危机、政治秩序的危机、国家的危机、大民族的危机,在这一系列的忧患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着艰难的思想蜕变,在血淋淋的挣脱旧日信仰的同时,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三)儒家思想的实践取向

虽然古典非正统哲学在兴起,佛教在努力调和信仰,西方的自然科学主义也在大量地流入,但在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有教养的中国人,延续千年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与价值导向。

国难当前,西方的理性工具手段所取得的功利效果在现实中冲击着一个民族的生存。面对这样的“异端”,要当时的知识分子立刻抛弃道德追求而追随西方制度是不现实的,为了应对,调和折衷是他们能采用的唯一方式。

二、改良与革命,两种思想的发源

戊戌变法是一次改良性的政治运动,它的失败使国人进一步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是不能够挽救中国的。虽然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国人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然而,这一段时间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国家的政治运动,更是新旧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这一段交锋也充分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在转换时的承继性。

(一)康有为 保守与激进的融合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传统的学者官僚家庭。康有为自幼的自我形象定位是圣哲贤人,在从师朱次琦后,思想上转为倾向于儒家思想家的实践意义。同时,在对佛教的精心领悟后,康有为将自我的形象定位为圣哲贤人与救苦救难的菩萨的结合体,在完成信仰定位的过程中,康有为逐渐从传统的儒生转变为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追求建立道德精神秩序的新儒生。在他的思想中,保守与激进两种意识努力地寻求着一种融合的道路。

康有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孟子学说的基础上,他认为“天”是一种有自身思想与行动能力的物体,“天”通过天子及阴阳二气不断调和从而引导社会秩序的协调发展。因此,康有为对于王朝的统治是深信不疑的,在他对社会制度的乌托邦幻想中,古代贤者所建

立的道德体系的王朝统治是最完美的制度。然而在现在的社会现实中,重新建立这样的秩序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对道德修养的完善化。康有为同意孟子对人性本善的论点,但他认为孟子所提到的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而是一种善的潜能,在人性具有这种潜能的基础上通过自身修养与社会引导,就能够使道德精神意识化,从而克服人性中恶的潜能。对王朝的维护以及对道德精神化的追求使康有为在意识领域仍然陷入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在这种基础上,即使他对现存的政治制度有所怀疑,他所需要的改革也是在儒家自身体系中完成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道德秩序的“纠偏”,而不可能是完全推翻后的重建。

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康有为同样继续追寻“普遍关怀”的“仁”的思想。康有为的普遍关怀是一种面向全人类的关怀,这种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种族、国家等级等等的限制。用他的这种关怀精神与儒家的“仁爱”相比照,康有为的关怀显然并不仅限于儒家的等级之爱。儒家的仁是通过三纲的礼来约束的,三纲限定了等级,而康有为却把墨家的“兼爱”与佛家的“众生平等”与“仁”相融会,表现了一定的对儒家的叛逆性。这种普遍关怀使康有为意识到了民主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对立面,如果要民主,“天子”的权力必须削弱。康有为所追求的政治制度是深受西学及日本影响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在这条追求道路上,康有为似乎总是偏移政治上的功利寻求,对道德建设情有独钟,这样的左右摇摆也许注定他的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软弱的是思想本身。

康有为可以称为改良派的代表与领袖,他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持改良主张的知识分子们一种显著的特点,在传统的维护道德秩序与现实的拯救民族危亡中,他们正在作出艰难的选择。在选择时,改良派们可能实在无法摆脱对道德精神建设的传统向往,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学说和拯救世界的普遍主义理。新旧意识形态的交锋是如何的激烈,在当时的改良派身上能够得到最好的体现,社会存在的改变也许是一夜之间的,但社会意识的改变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

(二)章炳麟 革命是一种需要最高道德的事业

章炳麟的思想与改良派的分歧在于对儒家传统的出发点上。章遵循荀子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他用摆脱迷信的观点看待宇宙,并认为儒家思想的伟大之处正是由于它超越了迷信,回归尘世。他的这种来源于荀子的自然主义观念使他很自然地使儒家文化氛围过渡到西方科学主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章炳麟

对于王朝存在的天然合理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社会秩序并非是在“天子”的引导下,也并不是遵循所谓天的意志,而在于“群”的能力^[2]。人类具有群体活动的的能力,因此人类可以使役一些在某些能力上胜过人类的动物。所以群体组织能力越发达,种族生存就愈加旺盛。所以,免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提高民族的群体能力,建立可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制度,

章炳麟对王朝制度的全面否定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滑向了“法家”理论。章炳麟认为依法执政能够抵制专制制度的危害,也能够促进社会的公道,因此,在政治上,章炳麟彻底放弃了儒家以德为政的思想,转而提倡法家依法施政的思想。在依法施政的基础上,章炳麟逐渐完成了民主政体思想的转变,他所期望的政府是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体现,如果依然有凌驾于法的君主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合乎法的精神的。

但是,章炳麟对“法”的推崇也陷入一种矛盾,这就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打在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关于道德的追求。法家,是以漠视道德推崇法治而著称的,但是章炳麟却不能忽略道德的力量。道德冲动使章炳麟非常怀疑在法的允许范围下,权利与利益是否真正能够做到“众生平等”,也许民主政府或者议会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为权势阶级服务的,会引起社会的急剧不平等,扩大阶级差别。在道德维度下,章炳麟提出革命是需要最高道德的事业,这样的观念建立在章炳麟对革命后秩序建设的期许中,即只有拥有最高的道德意识,才能够使法的社会趋于公正与平等。

这是一场艰难的意识战争,章炳麟后来放弃了早期的自然主义科学倾向转而以佛家的形而上学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正是在意识的自我挣扎中章炳麟无法寻找到一种脱离传统道德而存在的民主秩序。无法从儒家的氛围中完全脱身而出,对西方制度的道德意义上的怀疑也许只是章炳麟个人的意识问题。但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代表了革命者的信仰基础,也代表了革命者与改良派同样的意识彷徨。

三、象征体系的消退与个人信仰的重置

那个挣扎的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今天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当时意识领域的挣脱与重建是如何的艰难。20世纪30年代,广大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中国的社会问题仍然以各种面目出现时,一批知识分子转而开始了社会功能的研究。费孝通博

士正是其中的一员。费孝通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而社会变迁是民族与文化的接触引起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处境的变迁带来的^[3]。所以,无论是以革命的方式引进新价值观念,或以反革命的方式坚持传统文化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4]。对社会功能的研究使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转而从更务实的经济、政治生活入手去解决中国问题。反观19世纪末的知识精英们,那些闪光的名字无不带着一丝悲哀的光环。

这点悲哀的光环正是意识形态笼罩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概念。但是,面对那时的中国,也许应当更倾向于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所指出的那样,中性的看待意识形态是如何服务于维持统治关系的。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千年奠基使它形成了一种“象征形式”,因此,“一切思想都处在历史之中,而且是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反过来设法理解这个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统一象征排除异己,使用感召力使之合理化,普遍化等等手段,在一代代的王朝更迭中,保持着自身系统的屹然不动。它与统治者阶级的利益是恒久相连的,它也使中国的统治秩序继承着王朝的专制性。19世纪末,儒家思想的象征形式通过各种方式开始消隐,一切转移注意力或美化的事实,都不能再使意识形态虚饰现实秩序的腐朽,而作为儒家思想支持群体的儒生们,从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他们不希望看到儒家的败落;从他们个人的修行出发,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重置;同样的,从他们自身的圣贤定位出发,国耻家恨也是不可以漠视的现实。

中国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中国的社会变迁从清王朝结束后就一直有真正终结变迁的历程,就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当儒家文化结束了它在意识领域的统治后,中国整体文化的调整仍然在艰难的努力着。

“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学说和活动,它错误的认为观念是自主的和有效的,它不了解社会历史生活的真正情况与特点。”^[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以观念反驳观念,却没有发现世界仍然是真实的。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也在以观念反驳观念,但在他们的历史大背景下,在他们的阶级意识影响下,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作出努力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张灏.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8.
- [2] 约翰·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高铨,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126.
- [3] 李友梅. 费孝通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5. 5.
- [4]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
- [5]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 译.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5. 26.

Sense of Crisis in Modern China

LI Xing

(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of the Militar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a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national crisis. In this time of crisi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rvival and salvation. Whe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happens, Reformists and Revolution faction start exploration to Chinese future in consciousness domai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ideology; crisis

(编辑 范华丽)

(上接第 70 页)

Explain Modern West Expense Idea in Mozi's Expense Idea

FU Bi - chun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 China)

LI Li - jie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Chongqing 40004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few thousand years between Mozi's expense idea and modern west expense idea, but there are common points in expense idea. Through explaining modern west expense idea in Mozi's expense idea, we can more see the virtue and historic progresses about Mozi's expense idea.

Key Words thoughts of expense depending on produce; thoughts of expense depending on permanent - income; thoughts of long expense depending on life - cycle

(编辑 范华丽)

作者: [李幸, LI Xing](#)
作者单位: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南京, 210009](#)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7, 9 (2)

参考文献(5条)

1. [张灏](#)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6
2. [约翰·汤普森](#); [高铨](#)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2005
3. [李友梅](#) [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 2005
4. [费孝通](#) [江村经济](#) 2005
5. [卡尔·曼海姆](#); [黎鸣](#); [李书崇](#)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2005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702019.aspx